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王庆成 虞和平 主编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日〕滨下武志 著

朱荫贵 欧阳菲 译

虞和平 校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日〕滨下武志 著
朱荫贵 欧阳菲 译
虞和平 校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字: 01-98-065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日) 滨下武志著; 朱荫贵, 欧阳菲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1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ISBN 7-5004-2379-9

I. 近… II. ①滨… ②朱… ③欧… III. ①朝贡贸易-中国-近代②朝贡贸易-亚洲-近代 IV. F7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53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对以往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中所采用的“西方冲击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从而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书中所论述的商品流通渠道、货币汇兑渠道、香港在亚洲经济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和日本传统经济中的某些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对近代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的影响等问题，都颇有新意。该书还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探讨了这些近代以前的传统经济因素和经济圈对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书中采用了大量宝贵的外文资料，如英国议会文书等，对国内的研究者是不可多得的。因此，该书对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无论在研究视野、理论方法和资料采用上都有较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也对当前中国与亚太经济圈和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辑说明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好地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发展、提高我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途径之一。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选译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1987年3月

序 言

王 庆 成

滨下武志教授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的中译本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之一，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滨下教授早年在东京大学专攻东洋史，历在东洋文库、一桥大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教授，1996—1998年担任这个著名的研究所的所长。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89）、《香港——亚洲的网络都市》（1996）、《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1997）等以及与其他学者合著合编的著作多种。《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原出版于1990年，富有理论性和开创性，堪称他的代表作。我们选择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相信必能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国际契机”一词，作者用以指国际环境。近代中国开始之时处于怎样的国际环境？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了别开生面的见解。他认为，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形成了“亚洲经济圈”，这就是“前近代亚洲市场”。他认为，欧洲接触亚洲，不仅是欧洲对亚洲的“冲击”，而且也是欧洲面对来自亚洲的

“冲击”，即欧洲必须面对一个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按自身规律运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欧洲虽然将这一亚洲市场纳入了世界市场，但后者在世界经济中仍占据相应的位置，并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是从广阔对应的地域关系的角度，揭示近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国际契机，这就是一方面探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所形成的亚洲内部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又根据这种既有的关系，对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亚洲同欧洲的关系从新的角度作重新理解，即从欧洲如何加入到亚洲既有的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从亚洲所看到的对欧关系。作者的这些探讨，是非常富有新意的，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讨论，相信也必能启发我国学者的思考，大有助于促进我国近代史的研究。

本书主要是从经济贸易方面阐释近代中国史，但也有不少篇幅讨论思想认识历史方面的问题，还提出从现代史及现代中国的动向出发，来打开近代史研究的视角。这些篇章必定也会吸引我国研究者的注意。

作者不同意把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中西关系归结为“西方冲击”论。他说，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清朝政府看来只是地方事件，它不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当然起点和历史分期标志。他认为，如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近代标志的话，中国的近代应回溯到19世纪初；如着眼于中国国内旧制度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萌生，则中国的近代似应开端于19世纪后半期。作者关于中国近代之开始的这些看法也很值得重视。当然，重大事件之成为重大事件并不以当时人们对它的认识为转移，它之影响于历史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从社会

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近代时期所逐渐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应该是客观世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滨下武志教授是中国许多学者的朋友。我认识他已有多年，还几次一起在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知道他是一位极勤奋的学者，在中国和欧美都享有声誉。我很高兴把他的著作的中译本介绍给我国读者。我们这套丛书在创议时就曾注意要同时介绍日本和欧洲学者的著作。在如何介绍日本学者的著作方面，我要感谢小岛晋治教授当时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我们也着手做过一些事，但后来由于经费等原因，那些工作迄今未能实现。滨下教授的著作是这套丛书中第一本原文为日文的书。我希望以后还有可能继续介绍日本和欧美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的成果。

这套丛书在创办之初有若干位学者参加了编委会，商讨决定选题等重要问题。编委们对工作的开展起了指导作用。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我们商定以新的方式继续出版这套丛书，由我和虞和平同志任主编。在这里，谨向原编委会的各位朋友致谢，并希望今后仍能得到他们的指导。

1998年9月

中文版前言

滨下武志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的中文版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研究者，能够把自己研究中的一些想法和结论，介绍给我所研究的中国的学者，这使我十分高兴。而中国的同行们会怎样对待我的想法，怎样评价我的研究，也是我十分期待的事情。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是以我 70 年代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为基础的著作。这本书比较有代表性地阐述了我对亚洲近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看法。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关于亚洲近代史开启的契机，以及以整个为亚洲对象的亚洲近代史怎样把握的问题。我认为，亚洲各国各地区有着自己固有的不同历史，因而在寻求一种既能有效地承继过去的传统，又能全面地把握各国不同历史特质和现状；进而把亚洲整体作为探求对象的方法，至今还很难说已经确立。只有以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并将其作为历史探讨的对象，从中寻求把握世界史进程的契机，同时通过对成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媒介体的各国历史的把

握，才有可能对近代亚洲取得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要从体现历史纽带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整体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发展形态的亚洲近代。只有从这个角度去探求中国的位置及其变化，才是考察中国近代道路的有效方法。同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从亚洲方面去探讨近代亚洲诸国、诸地区的“开国”、“开港”、欧洲势力的形成以及殖民地化的历史脉络和进程。

但是，过去的一般看法，可以说都是以 19 世纪中叶英国产业资本家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对封闭的亚洲及未开拓的亚洲市场进行冲击，并以此冲击和亚洲市场的被打开作为亚洲近代开始的标志。亚洲方面，则是从与此相对应的民族的反应和反抗，以及逐步觉醒逐步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来标志着进入亚洲近代的。在这里，资本主义被看成等同于工业化，工业化又等同于近代化。而关于达到此点的途径的讨论，又存在内因外因的两分论。也就是说，不管是促使中国还是促使亚洲近代开始的“契机”，都被看成是“西力东渐”即“西方冲击”的结果。但是，本书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时，“契机”却并非仅限于欧洲对亚洲的关系，我是从东亚与中国、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即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方面进行探讨的。通过对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考察亚

洲近代历史得知，西欧进入亚洲时首先要面对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也就是说，欧洲也有一个面对来自于亚洲“冲击”的问题。所以西方诸国一方面采取加入和利用亚洲原有的朝贡贸易形成的网络，另一方面则通过介入朝贡关系的一角，并试图使其改变的做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这种朝贡贸易体系的内在变化，不仅是中国近代的内容，同时也是影响和涉及东亚、东南亚近代内在关系的缘故。

其二，我比较强调地域经济圈的作用。以往在追求新的国际合作观念方面，历来都是将“国家”以及由他们相互之间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这种分析框架进而又成为演变种种历史史实的舞台。但是，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被包容进去。因而对于如何把握具有复合和多重色彩的实态“地域圈”的内在联系就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研究经济史时，把处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媒介地位的“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 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史的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己的认识中寻找本身的位置。而地域圈中各地区的结合，必然形成发挥网络中介作用

^{*} 译者注：“地域圈”在这里主要是指一种地域经济关系，即跨越一个或若干个国家的主要以经济行为为纽带形成密切关系的地区，以下均同。

的中枢地，新加坡、马六甲、琉球、香港等就是具有这种中介作用的中枢地。这些中枢地在近代亚洲史上人、财、物的流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作用的存在。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给我提供了一个与中国学者、读者进行交流的机会，为此，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王庆成先生和虞和平先生，是他们的努力，使我的这本书有了译成中文本的可能。我还要感谢朱荫贵先生和欧阳菲女士辛勤的翻译工作。另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慨然应允出版此书，我感到十分荣幸，在此，我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8年8月于东京

前 言

滨下武志

本书是针对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国际契机，从广阔对应的地域关系角度进行揭示的一种尝试。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迄今为止，在作为“西力东渐”来把握的时候，实际无非等同于“西方冲击”而已。但是，在本书对此进行探讨时，“国际契机”却并非仅限于欧洲对亚洲的关系。在此，首先是从东亚和中国，东南亚和中国的关系之中，即从中国与亚洲的关系之中来进行探讨。因为我们认为，在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的内在变化，不仅是中国近代的内容，而且也是影响和延及东亚、东南亚近代内在关系的缘故。

根据以上的基本观点，自然也就决定了对第二个问题即中国和欧洲间关系从历史角度的理解。也就是说，应当改变成从欧洲是如何加入亚洲历史上业已形成的，有着自身规律的朝贡秩序、朝贡贸易关系的角度，重新描写从亚洲看到的对欧关系。

这种观点，促使我们对迄今为止形成的“西方冲击论”

进行再探讨。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把清朝统治下发生的地方事件——1839年至1842年的焚烧鸦片事件（以后此事件被称为鸦片战争，但当时清朝并未把它看作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当然起点和历史分期标志的时候，窃以为，如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近代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则应追溯到19世纪初。如着眼于中国国内旧制度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萌生，那么中国的近代，开端于19世纪后半期似乎更为妥当。

但是，问题还在于，归根结底，要从体现着历史纽带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总体的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延续形态的亚洲的近代。并且只有从亚洲的近代中去探求中国的位置及其变化，才是考察中国近代道路的方法。而且，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从亚洲方面推论出亚洲诸国、诸地区的“开国”、“开港”、欧洲势力的形成以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以上述问题为中心，本书分为以下的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推导出亚洲区域内在的历史纽带，并尝试从其制度方面、市场方面的展开进行描述，这部分包括序章、第一章和第二章。

第二部分，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特别是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怎样加入中国的贸易体系，以这一点为中心，即以贸易金融、投资行动的变化为主线进行探求。这部分相当于第三和第四章。

第三部分，试图从人、物、财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

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在把握地区间关系之时，当构想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的时候，地域圈中各地区的结合部，必然形成发挥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历史上，亚洲绝非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而构成。这些地域圈相互以新加坡、马六甲、琉球、香港等为中心而交叉存在。其中，第五章将具体探讨香港的作用。

围绕近代中国对亚洲的关系、对欧洲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应当充分考虑数百年以来的历史背景所给予这些关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不能看成是可以单纯的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说明。在此需寻求的视野，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它应当在意识到历史认识主体的同时，去描绘出同时代人的时代认识，并将之与现代的认识主体的课题意识进行对比和质疑，由此，去辨别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脉络，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面貌的再构成的任务。这种视野，就是以探求历史学规律的“总体史”为目标，而且也是历史研究在今天得以存在的理由。这种方法的综合将力图尽量体现在本书第六章中。第六章反映的基本观点是通过从序章开始至第五章的综合历史分析的视点，围绕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和欧洲间的关系，以及通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间存在的、对亚洲和欧洲间认识差异的反复思考而获得的看法。由于有此意识，又是笔者所关心问题的最根本的反映和思考，因而也可以把本章作为开篇来阅读。

结尾部分，因为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与现代史研

究相连续的缘故，因而，以现代中国的地域社会为对象进行了探讨。这种探讨，从现代史以及现代中国的动向出发，反过来又打开了近代史研究的问题视角，而且意味着是获得研究动机的某种重要方法。当我们一方面强烈地感受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历史观念；一方面考虑“作为历史而存在的现在”的同时，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除了切望能洞察那些与现代中国、现代亚洲、现代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方方面面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企求呢？

1990年7月

目 录

序 言	王庆成 (1)
中文版前言	滨下武志 (4)
前 言	滨下武志 (8)

序章 近代亚洲史研究的课题.....	(1)
一 亚洲历史全貌的再探讨.....	(1)
二 亚洲和西欧.....	(4)
三 中国和日本.....	(7)
四 近代亚洲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9)
(一) 前近代亚洲区域市场的形成	(10)
(二) 西欧加入亚洲市场——茶叶和 白银	(11)
(三) 近代亚洲市场	(12)
五 传统经济和现代化问题	(17)
(一) 亚洲的近代化	(17)
(二) 传统理论的对象和方法	(19)
(三) 传统和近代的关系	(20)
(四) 中国经济史的诸特质	(21)
第一章 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	(29)
引言	(29)
一 朝贡的概念和形态	(33)
二 朝贡体系的结构	(38)